

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研究综述

蒋 超

摘要：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和新阶段，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为重要契机，以马克思东方社会演进理论为理论基础，新时期要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建构领导权、掌握主动权、提升话语权，共创中华民族发展的又一个辉煌。以此为目的，后续要着力于宏观、中观、微观意识形态研究，构成意识形态的整体研究；着重于对意识形态功能性作用的研究；重点阐述新时代的社会思潮；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社会思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的理论意蕴研究”（19FKSB043）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 (2021) 09-0058-08

理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需要对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内在的价值张力进行系统考察。意识形态自觉与价值理性认同具有逻辑同构关系。^①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工具主义倾向以及社会思潮不同程度的冲击与消解，主流意识和主体价值观在现实的表述中存在事与愿违的偏差。故此，我们要从理论基础、类别甄选、路径展示、现实困境、契合勘探几个方面，整合当前学界对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整合为基础，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进程，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

一、理论基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

（一）意识形态管理权

意识形态管理权理论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指导。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深刻影响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社会价值的形塑。自特拉西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一观念以来，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研究不绝如缕。其中，最重要的要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持批判的态度，其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分为“1844年以前”“1845到1856年”“1857到1870年”“1871到1895年”四个阶段。^②此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坚守，要发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和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把国家发展战略布局和党的思想建设、社会经济建设统一起来。^③同时，马克思东方社会形态理论是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革命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思想资源，有利于推进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指导的历史进程。^④

意识形态辩证法思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资源。面对以伯恩斯坦为主要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列宁批判修正主义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进而舍弃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路径。在社会主义形成路径方面，列宁提出了“一国胜利论”的科学路径以及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建设的思想，有力地回击了机会主义倡导的“世界革命共同胜利论”。^⑤历史总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是在俄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是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中形成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因此，我们要充分汲取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营养，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⑥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理性认同与意识形态自觉具有同构性，是异质性和同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是实现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思想保障。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内在不同的张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是纯工具性的运用，其内部的张力以及文化发展的客观性决定了传统文化的非意识形态性存在。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是互为保障性的必然存在，是共融和共生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应然要求。^⑧

文化领导权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关键。文化是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文化资本，是打造民族豪气、锤炼人民硬气、塑造国家底气的内生动力。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要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这要求我们既要发展好政治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也要统筹好市民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将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接受。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认为文化领导权建设是深化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助推器，是发挥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力量的关键。^⑨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原创价值。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径，并把个人、社会和国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不仅如此，中国的原创价值观和原创文化

具有世界意义，为世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⑩价值观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本质的、现实的反应。因此，只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提高价值观的感召力、生命力和实践性才能实现价值观的现实转化。^⑪

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⑫文化自信的核心是文化价值观的自信，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时代的价值和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它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倡导的，具有厚实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具有理论与实践、结构与功能的统一性。^⑬故此，要协调发展好“四个自信”之间的历史和辩证的关系。

二、类别甄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分类阐释

(一)宏观意识形态研究

宏观意识形态研究主要表现为整体性研究。宏观意识形态主要从整体形式和内容上对意识形态进行阐释，具有宏大的理论视野。以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制为宏观研究视角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具有整体性的框架，涵盖了实践主体、目标对象、实施方式和运作流程等方面。^⑭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尽管学界对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习近平意识形态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还存在缺陷，尤其是对整体性中的理论结构和精神实质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⑮因此，后续研究应该从整体视角出发，论述意识形态话语特点、意识形态宣传方式和意识形态领导体系。同时，对于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研究要从价值整体性、理论整体性、策略整体性三个方面来宏观把握其思想精髓。^⑯不过，也有学者从历史方位、核心要求、理论支撑以及全面布局等方面探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研究。^⑰总之，学界以整体性视角为着力点研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而整体性视角也是研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部分，为系统性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中观意识形态研究

中观视角重在研究意识形态整体性中各个部分

及其辩证统一关系。阶层分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表现为：阶层分化是深化社会主流思想的实践基础，而社会主流思想为阶层整合提供定位导航，要辩证统一看待二者的关系。^⑩高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战场，大学生既感受到大数据带来的思想张力，也难免受到大数据时代的意识形态冲击。从而，要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抓手，开展对大学生的国家形象建设和以及社会主流价值熏陶。^⑪同时，从社会发展视角看，要从维护主体安全、效果安全和秩序安全三重维度来开展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⑫当然，也不能忽视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实际上，意识形态是“观念集合”向“现实诉求”的动态发展过程，期间容易被网络幻想和网络政治权力所操控，进而造成偏离“本真”以及“碎片化”危险的生产。意识形态话语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不过，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话语的“去中心化”，而少有涉及“去中心化”之后的“再中心化”研究。^⑬但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不能只有以批判“去中心化”为发展向度的“西方中心主义”，更应该夯实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立足全球视野，通过“再中心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来提升国际话语权。

(三)微观意识形态研究

微观意识形态研究主要探讨个人、机构或者组成内部的意识形态发展动向。微观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以“惩罚”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管控逐渐转向以“规训”为主要控制手段的转变。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讨论了规训形式、规训过程和规训转化。米歇尔·福柯引用了雅克·兰契的好奇心概念，将其作为对“无法容忍的形象”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些方法，可以重塑“刑罚旁观者”与“被代表者”“被监禁者”之间的关系，以产生出更为批判性以及善解人意的且对社会负责的规训。^⑭米歇尔·福柯阐述了“人是自动驯服的机器”思想，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层面，人成为被资本主义隐性操作的对象，当人们的“被迫”变得“习以为常”的时候，那么社会纪律就成为了身体规训的“自拘形式”。^⑮另外，以劳动中的劳资关系为研究视角，麦克·布洛维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意识形态控制方式的转变，即资本家建立外在“和谐”的劳资关系表象来迷惑或者掩盖阶级对立的实质。

三、路径展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路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第一，拓展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历史和实践的三维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夯实理论的现实转化，即从发生学向功能学转化，再上升到国家权力和国家治理层面。期间，要立足意识形态主体、根本目的、主要任务、实现条件以及重点保障五个方面，通过“软硬兼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提升中国道路的解释权和政治结构的建设权。^⑯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整体研究视角，夯实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人民性、问题导向性的三维统一，举旗定向、凝心聚力、强基固本以及共建共享，确保和筑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⑰

第二，深化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建设。文化领导权建设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必然之举。葛兰西从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发展中，提出了中西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发展路径，鉴于东方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从而在革命道路上必须牢牢掌握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立足实践的价值导向，对市民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引，进而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即使在历史发展的今天，仍然对中国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⑱另外，同样是提倡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列宁提出了以获得政治领导权为中心目标的发展战略，但是也离不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支撑，二者是一体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列宁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再是其研究的中心内容，他转而研究通过意识形态取得阶级斗争的胜利、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以及“思想领导者”概念。^⑲

(二)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第一，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深入民心的建设。人民群众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者和参与者，扮演着“主体”与“客体”的作用。从意识形态话语权培育路径看，必须从话语权威、话语载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实用性、话语环境、话语的主动性等方面开展意识形态与民心建设的协同工作。并且，我们还应科学阐释“如何说”“怎么说”“说什么”以及“为谁说”是实现意识形态与民心教育有效结合的重要逻辑和现实依据。^⑳不仅如此，基

于话语内在的理论张力以及外在传播的现实需求，要坚持话语理论学习结合思想政治话语宣传的方式，双管齐下、内外结合地提升掌握话语的能力，增强主流话语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话语的本质，实际上是思想上的统治权与支配权。^②话语权代表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说话权，其背后反映的是话语使用者的主导权以及掌控全局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就是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领导，以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此外，要注意话语嬗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影响。随着意识形态话语“弱化”与“边缘化”的出现，我们党从话语体系、话语表达、话语对象化传播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借助大数据和新媒体的力量来全面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③

(三)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第一，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安全观。列宁把意识形态发展为“描述性”的中性概念，区别于之前的“全盘否定”或者“直接肯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性运用。实际上，阐述意识形态安全观就是要用辩证和全面的视角把握意识形态，即把它看作是党性与阶级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在人，人要成为掌控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而不是被动的“物化”存在。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的保障，是内在契合和同一体，也即主流意识形态天然包含着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民族的统一亟需发挥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功能。^⑤

第二，继承党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领导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领导是党的内在要求和经验教训，而思想建设更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抓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在新时代面临新的问题，需要用党的正确领导来进行化解。总的来说，要从党员领导干部、文化体制改革、筑牢意识形态堡垒、大众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理论创新发展几个方面出发，进一步推进 21 世纪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⑥

第三，筑牢意识形态对话平台。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核心就是要形成共同意识，凝聚广大群众的力量，开展民主伟大复兴的实践。因此，必须搭建起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平

台，督促共同意识的形成。而对话平台应该是政党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多元化、制度建设的互补统一。同时，要注意“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话语权特殊化，避免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⑦

四、现实困境：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冲击

(一)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转向

第一，东西方思想格局的转向。伴随着世界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进，东西方的思想格局、社会格局和国家格局发展了巨大的转变。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世界影响力转向、“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向“东方社会形态演进”的转向、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向中国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崛起的转向。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依据的世界历史格局正在发生巨大的调整与重塑，这既为世界国家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契机，也为民族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挑战。故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及时调整思想路线，提升国际话语权，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⑧

第二，提高应对社会思潮的制度实效能力。^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建设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事实上，用制度来应对社会思潮的嬗变的逻辑，就是坚持现实性与思想性、稳定性与易变性、全局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发展策略，通过切实可行的制度来规范思想的发展方向。

(二)多元文化的冲击

第一，多元文化对价值观的冲击。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是不可分割、辩证统一的关系，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外来文化，单一地发展民族的文化，也不能全盘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舍弃优秀传统文化。科学的方法是坚持社会主流文化，汲取和借鉴世界多元文化，形成中外文化共同繁荣的历史局面。然而，现实存在的多元文化不断冲击着青年的社会价值观，致使青年出现价值观偏差以及主流价值观缺失的困境。面对如此困境，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夯实主流文化“入脑”和“入心”教育。^⑩

第二，多元文化对意识形态认同的冲击。中国社会经历了早期的“精英认同”向“民众认同”的

转变。^③尤其是在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中,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大众化的传播,凝聚人民群众的全部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面对国内外多元文化的冲击,意识形态认同的困境主要表现为:认同主体教育的虚化、认同客体的解释力下降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空泛化的发展倾向,这导致社会主流形态发展不稳的尴尬局面。^④

(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冲击

第一,历史虚无主义是否定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西方国家对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冲击,其背后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否定社会形态理论的存在,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规律的。新一轮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冲击更具破坏性和隐蔽性,其主要特点是反对革命,有着明确的政治导向。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西方国家对新中国进行意识形态输入以及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提出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主导地位,展现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以及实现民族崛起的信心。^⑤

第二,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科学”的表象以及“辩证”的研究方法。其“科学”的表象主要通过“意识本体论”“历史偶然性”以及“历史假设性”来遮蔽人们探索和认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在论证方法上,历史虚无主义采用简单粗暴的“感性直观”研究方式,直接把经验世界看作客观历史,甚至直接主观化客观规律,最终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⑥

(四)新社会思潮的冲击

一是当代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社会思潮,并在新时期的中国有了新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外在的“民主”与内在的“政治权力争夺”的背离以及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耦合等方面。^⑦此外,民粹主义深刻影响国家政治发展。联合国的193个成员国均已承诺遵循指导原则,不遗余力地实现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然而,不断上升的民粹主义运动通过挑战多边合作和自由民主,越来越多地影响许多国家的政治辩论。^⑧同时,在“后真相”时代,网络空间的民粹主义愈加泛滥,民粹主义者通过情感、话语导向为主要方式的思想渗透来操控网络舆论的发展。^⑨

二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作为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社会主义把经济危机转嫁为生态危机,主张社会改革的历史道路,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不利于新时代青年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⑩反全球化或者逆全球化是当前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存在以及“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威胁,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⑪

五、契合勘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

(一)夯实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

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伟大的实践更需要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回归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意涵就是要坚持制度分析,深入生产研究,始终坚持不断发展的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路径。除此之外,还要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构建交易秩序,拓展对交易理论范畴的系统认识。^⑫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发生了转变,主要包括价值取向、世界维度、功能维度的转变,实现了从“政治主导”向“多元协调”,“经济中心发展逻辑”向“人民为中心发展逻辑”,“独立发展”向“世界认同”的转变,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念。^⑬

二是“拓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托,不断凝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要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拓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⑭

(二)助推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

第一,完善党对意识形态的科学领导。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在新时代表现为理论创新和话语创新,这为社会主义发展注入了生命力。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坚持人民导向,科学审视国情和初级阶段的特征,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彰显中国治

理现代化和中国价值观的世界意义。^③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时代的新任务和满足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话语建构过程中要警惕“表达”“释义”“传播”的困境,使党的话语传播真正“入脑”和“入心”。^④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形塑民族意识。疫情防控对党和人民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挑战。新时期,疫情防控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共同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党要凝聚人民意识,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既要发扬疫情防控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也要做好自我反思,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⑤此外,疫情防控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传播中国故事,向世界民族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提升国际话语权

第一,提升话语政治权力。国家话语权事关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而话语背后更多反映的是政治权力、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国家对政治诉求的表达。西方国家的话语分析已经形成了研究范式,相对而言,中国亟需从话语类型、话语层级和话语过程方面拓展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谋求政治地位,实现国家诉求。^⑥同时,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政治诉求,必须要依靠法治、共同价值以及话语,全力以赴共建国际话语权。^⑦

第二,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提升国际话语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共同治理”和“成果共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以及“冷战思维”的有力打击。中国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通过实践主导力、实践创新力、联动力、实践亲和力来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⑧

(四)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一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入心”和“入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脱离人民群众的抽象存在,而是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存在。要以“接地气”的传播方式,来提升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知力和认同度,通过“共情”的传播搭建起国家与社会、个人真心、真情、真实的意识形态桥梁。当然,要讲

好中国故事,向世界真实地传达中国价值,展示中国智慧,凝聚中华民族共同的意志。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舆论传播,拓展网民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引领社会发展的正能量发展。^⑨

二是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认同。国家治理的成败在于国家制度逻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逻辑实现了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换,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突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路径,推进法治与人治的结合,在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从隐性和显性方面夯实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认同。^⑩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社会治理成效方面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道路的认同,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

六、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借助计量可视化分析当前学界关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发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等。从相关论述中可以发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分割、相互共同的辩证统一体。一方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的安定繁荣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变”与“不变”的协调发展,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变,通过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群众路线,讲好中国故事,凝聚政治认同、加强思想意志、完善组织结构,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稳发展,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说,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到,学界对于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来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分类阐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进路、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几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观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然而,学界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

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研究不足。已有的研究中很少对意识形态从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分类,而对于分类后的整体结构研究则更为稀少。二是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单一。尽管从数量上来说,学界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研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单一却严重影响着研究质量的提升。因此,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后续的研究可以以现有的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为研究基础,并从以下方面进行深化与拓展:

一是着力于宏观、中观、微观意识形态研究,构成意识形态的整体研究。事实上,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显性与隐性并存的状况,会潜移默化或者立竿见影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要从不同视域、不同学科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以此来确保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安定有序以及国家的繁荣稳定。

二是着重对意识形态功能性作用的研究。马克思早就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研究,并且批判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作用,批判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统治的工具性手段,严重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以及社会形态的有序演进。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用辩证的思维科学看待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看作中性的存在,并重点关注作为意识形态使用者的国家和个人,全面分析不同国家、不同领域是如何应用意识形态来实现自己私有目的的极端行为。

三是重点阐述新时代的社会思潮。社会思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密切相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道路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社会思潮在不同时代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对于不同形式社会思潮的考察以及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性质的判定应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内容。

四是侧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以及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外在政治诉求。因此,后续的研究亟需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际话语权建设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

注释:

①⑦ 成长春、张廷干、汤荣光:《意识形态自觉与

价值理性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② 谢成宇:《当前我国社会思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姜佑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9期。

④ 凌取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研究》,苏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胡芳:《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辩证法及其当代价值——基于“一国首先胜利”论思想历程的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⑥③ 燕芳敏:《列宁意识形态安全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20年第2期。

⑧ 曹建文:《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审视与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⑨ 谢琦:《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启示》,《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

⑩ 刘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原创价值》,《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⑪ 徐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文化建设》,《红旗文稿》2020年第4期。

⑫ 金民卿:《以文化自信塑民族之魂》,《人民论坛》2019年第31期。

⑬ 李长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哲学审视》,《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⑭ 胡洪彬:《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问责制的构建与完善:一个整体性框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5期。

⑮ 胡伯项、梁莹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论述的研究进展与展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8年第6期。

⑯ 刘希刚、王永贵:《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整体性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⑰ 李辉、叶鑫:《十八大以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整体性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⑱ 于波、王员:《论阶层分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辩证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⑲ 段虹:《略论大数据分析与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年第11期。

⑳ 张平、赵昊杰:《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三重向度研究》,《长白学刊》2019年第2期。

㉑ 刘康:《“去中心化—再中心化”传播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双重困境及建构路径》,《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

②② See Sophie Fuggle, The Spectacle of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Tableau, The Diagram and the Calligram, Crime, Media, Culture, 2020, 16(1).

②③ 张一兵：《遵守纪律：自拘性规训社会的建构秘密——福柯〈规训与惩罚〉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5期。

②④ 唐爱军：《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三重阐释》，《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⑤ 王嘉、隋林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经验与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2期。

②⑥ 冯燕芳：《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再审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②⑦ 姜志强：《列宁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践逻辑及其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2期。

②⑧ 李美娴：《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增强民心认同的路径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22期。

②⑨ 张国启、汪丹丹：《论新时代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维度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

③⑩ 张振、郝凤：《新媒体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③⑪ 罗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③⑫ 朱继东：《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③⑬ 王岩、王翼：《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对话平台的建设及其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③⑭ 韩海涛：《21世纪世界社会思潮重大转向演进趋势探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5期。

③⑮ 李洁：《新时代以制度建设提升社会思潮引领实效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2期。

③⑯ 伍廉松、万美容：《冲击与引领：多元社会思潮与青年精神生活发展论析》，《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3期。

③⑰ 胡春阳：《早期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探析》，《长白学刊》2019年第6期。

③⑱ 胡春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历程研究》，安徽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

④⑩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红旗文稿》2009年第9期。

④⑪ 董玥、陈锡喜：《历史虚无主义三重理论基础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

④⑫ 布成良：《当代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实质与应对》，《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④⑬ See Christian Kroll, Vera Zipper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pulism, Ecological Economics, 2020, 176(10).

④⑭ 葛明驷：《“后真相”时代网络民粹主义主导舆论的机制及其治理》，《东岳论丛》2020年第5期。

④⑮ 徐岩：《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④⑯ 黄晓武：《危机与重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④⑰ 张道根、薛安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④⑱ 何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多维推进》，《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④⑲ 李婧：《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3期。

⑤⑩ 王永贵：《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境界——新中国70年意识形态建设的历程、经验和新时代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⑤⑪ 陈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提升及其实现路径》，《探索》2019年第1期。

⑤⑫ 本刊编辑部、陈娟：《讲好中国防疫抗疫故事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4期。

⑤⑬ 郭忠华、许楠：《政治学话语分析的类型、过程与层级——对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启示》，《探索》2020年第3期。

⑤⑭ 沈阳：《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三个核心要素》，《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⑤⑮ 李青璇、李艳：《论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实践话语权》，《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4期。

⑤⑯ 任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⑰ 夏志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蒋超，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211。

（责任编辑 陈 艾）